

中國崛起與全球比較政治學 展望



自二十世紀中葉起，全球逐步形成了一個統一社會科學知識和理論的生產場域，西方的學術群體和知識生產一直是這個全球性學術場域的主導者。簡而言之，所謂「現代」的社會科學研究，直到最近仍然是由西方的學術群體擔任主要生產者和領導者的。一直以來，現代即是西方，西方即是現代，二者幾乎不可區分。作為現代政治學的一個領域，比較政治學也同樣是由西方學術界建立、發展和領導的^①。雖然所謂的「西方」學術界也有很大的內部多樣性，而且也一向具有一定的「超越西方」、自我反省的視野，但是西方學術界生產的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以至整個社會科學，終歸無法完整全面地代表和反映非西方世界的視野、思想和實踐。

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社會在持續增長的經濟體量支撐下，逐步形成了在現代科學技術中——包括現代社會科學領域——和西方的科技界、學術界進行對話、競爭的能力。全球的科技、學術板塊構成由此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中國等新興社會的學術界生產的知識與思想，代表着有別於西方學術界生產的知識與思想。這將是中國崛起對全球比較政治學產生影響的最直接方式——它必然帶來中國學術的崛起，而中國學術將會有力度地參與、影響，甚至塑造全球知識和思想圖景。由此，全世界的知識、思想圖景將會由於中國學術群體的崛起而發生改變。中國的崛起，意味着中國的知識界未來有條件成為全球知識生產的重要「主體」。

中國崛起對全球比較政治的影響還來自另一個方面。隨着以中國為主的東亞經濟圈成為全球體量最大、最有活力的經濟板塊以及多元、生機勃勃的社會和文化圈，全球的社會科學研究必然更加關注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全球的比較政治學術工作者必然更加關注中國的政治實踐和政治現象，加以分析解釋，通過研究來檢驗比較政治、政治學的理論或構建新的理論。也就是說，中國將作為全球比較政治研究中愈趨重要的研究對象或「客體」。而全球知識界以中國為「客體」的研究，將會帶來新的理論視角和比較政治理論與範式的變化。

在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總結和思考中國崛起對比較政治學的影響具有深刻的意義。本文先簡單回顧以北美為代表的西方現當代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歷程以及其不可避免的「地方性」特徵；其次梳理以北美為主的比較政治學者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成果，說明比較政治學的一系列理論框架並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的政治，而且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也未能從中國這個「田野」帶給比較政治學足夠大的衝擊。隨後本文以一些具體例子說明，中國作為比較政治研究的「客體」，將可為未來比較政治研究提供大量和極其豐富的複雜性，供學者探索和發現；另一方面，中國學術群體作為全球比較政治研究新崛起的「主體」，將會在理論視角和價值規範層面為比較政治學研究帶來變化，影響着比較政治的知識和思想圖景。最後本文以展望一個全球性的比較政治體系作結。

一 比較政治學：地方性還是全球性？

比較政治學是一個全球性的學科。首先，全球多數大學或學術機構都有學者在從事比較政治研究；其次，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覆蓋全球的廣大地區。但是這種表面的全球性，實際上掩飾了比較政治學在內容、方法、認識論上非常嚴重的地方性。現代社會科學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研究，最早都起源於歐美學者對於「他者」的研究。西方在全球範圍推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政治實踐，促成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英、法、德等西方國家的學術界對非西方國家文化和社會研究的開端。和那個時代全球以歐洲為中心的政治和權力結構相對應，在知識學上，對這些「他者」地區的研究、知識構建與表述，深刻地表現出歐洲中心、「東方主義」、殖民主義等特徵^②。在歐洲和英國學術界，研究亞非拉地區（即當年歐洲列強爭奪和管理的殖民地）政治、社會、文化的工作，反映在地理學科的興起上。直到今天，英國和歐洲的大學裏不少研究第三世界的學者都還是在地理系（學院）任職。

當代意義上的比較政治研究的興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它是二十世紀以來政治學作為西方（主要是美國）大學裏一個正式的學科發展的結果。1903年美國政治學會（APSA）正式成立，標誌着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地位得到確立。政治理論、美國政治、歐洲政治是北美政治學早期的主要研究內容。對西方以外其他地區的政治研究則是這些「主流」政治研究的延伸，逐步就形成了「比較政治學」這一領域。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對非西方世界的知識需求急劇增長，對地區研究和比較政治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二戰的結束和冷戰的到來促進了學界對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的研究；同時，對第三世界地區的研究也大大增加，因為它們是冷戰雙方爭奪的前沿。在這種背景下，對美國和歐洲以外的政治實踐、政治現象加以研究，並力圖發現和構建能夠解釋跨國、跨地區和跨時段的概念和理論體系，使北美各高校的政治學系裏形成了比較政治這一學科領域。

因此，比較政治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冷戰時代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所限制。這主要表現為三個議題。第一，對全球的國家以政體理論進行分類，將西方的政治制度定義為民主，而將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定義為全能主義政體，並將後一類政體與法西斯的全能主義政體歸為同類；第二，對於西方（北美、西歐、大洋洲）和蘇聯陣營之外的廣大第三世界，其關注的核心是各種「威權主義」政體在何種情況下會更有可能轉變為西方式的「民主」政體，以及轉變為「民主」政體之後，如何能讓這樣的「民主」政體持續、穩定，而不會退回「威權」或「專制」政體^③；第三，試圖證明和展示「民主」體制的優越性，比如民主政體更能促進經濟增長、保護產權、避免饑荒，更具有合法性等等（類似地，國際關係領域也有民主政體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的論斷）。

可以說，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比較政治研究，很大一部分都可以歸入這三個議題。如果說政治學的首要問題是要回答「甚麼是好政府」和「好政府如何實現」，西方比較政治學則完成了兩個概念的替換。首先，西方的比較政治學將「好政府」（good government）定義為「民主」的政府；其次，將「民主的政府」定義為西方的多黨選舉制度。這兩個替換完成之後，西方的學術工作者和他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公民就毫無困難地認為：（1）西方的體制就是民主的；（2）西方的體制是優越的；（3）西方以外的地區的體制是落後的、不合法、不正當（illegitimate）、不道德，甚至邪惡的。

到後來，隨着所謂「第三波」民主化^④以及往後各次「顏色革命」的爆發，在眾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帶來大量失敗的「民主」體制。這些失敗的「民主轉型」，對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的價值基礎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學術界長期將「民主轉型」認定為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的最終目標，也是解決這些國家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但為何不少國家實現了「轉型」，卻在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並無起色，甚至陷入各種混亂和困境？這種情況下，比較政治學界提高了「民主」的標準，將西方發達國家和少數其他政體劃入「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這一概念的變化，非常方便地解決此前民主理論面對的信仰危機：民主理論並沒有錯誤，廣大發展中的非西方世界依然要向着民主這個目標努力，只不過，過去對民主的要求偏低，實現多黨選舉並不表示已經建成「民主」體制。新興的「民主」國家，依然要繼續努力發展出與西方一樣的政治制度。

總體來講，比較政治學領域中也一直存在其他的研究議題。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第三世界中很多國家出現了內戰和族群衝突，推動學術界對政治秩序和失序的研究。2001年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以及中東、非洲等地區的亂局，進一步推動着學術界對政治失序、國家崩潰等議題的研究。而放棄「民主」的概念，試圖構造「好政府」、「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並在尋求解釋「好政府」和治理的變量與機制的工作上，也產生了一些有價值的文獻^⑤。但比較政治對全球政治圖景的關注和塑造，明顯是由知識生產的主體——即西方政治學界的視野、價值觀和關切所決定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將近一個世紀的學科發展歷程中，比較政治在方法論、科學化的維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較政治學從社會心理學、人類學、統計分析等領域吸納了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在方法論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這一發展歷程中，比較政治研究已經從最初類似亞里士多德式的比較和分析各種政體、尋找最好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變成了廣泛、全面、客觀、準確地研究政治領域中所有制度、機制、過程、角色的學科。如果剝掉意識形態和規範價值，北美學界推動比較政治研究具備了嚴格的方法論品質和強烈的理論構建 (theory building) 的衝動。對政治領域的眾多議題，以北美為主的比較政治學科在基礎、中觀、微觀層面，都發展出不少理論或敘述，作為學術對話的基本參照體系和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這是近百年以來比較政治發展的最大成就。因此，非西方學者需要首先在方法論和科學性方面盡快達到西方學術界的前沿水平，然後才可以有效地參與到全球性的學術對話和討論中。

二 比較政治學和中國案例

到目前為止，由於比較政治一直是西方學術界研究西方以外地區的政治現象和政治實踐的學科領域，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首先是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他者」。由於二戰以後全球冷戰格局下的意識形態分野，中國的政體在比較政治學中是以缺乏合法性和不良政體的身份存在的。北美的比較政治學者帶着在北美生產的學術概念、價值背景、理論框架來到中國這個案例和「田野」，同時也從中國將一些概念和理論帶回北美的比較政治學術場域中。這兩個過程產生的影響都非常有限：一方面，以境外的知識和理論框架來試圖理解和解釋中國案例往往並不有效，而在中國生產出來的概念和理論對北美比較政治也沒有帶來太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國主要作為全球（即西方）比較政治研究中的「客體」而存在，但直到上世紀末，中國的學術群體尚未能參與到全球比較政治的知識與理論生產之中，因此比較政治並未能充分地利用中國這個案例來豐富與擴展其知識生產。

儘管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國內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和轉變，但在比較政治學中對中國經驗的正面敘述卻非常缺乏^⑥。比較政治對中國的解釋，關注的因變量往往是失敗、破碎、失衡、錯位、低效、對社會的鎮壓和環境的損害等方面。在政策實踐上，中國的扶貧、減貧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發展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給予了比較正面的關注^⑦，但比較政治研究對這類問題並不感興趣，或者主要還是關注減貧與扶貧中的政策或制度、機制的缺陷和政策結果的變異^⑧，並沒有從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成果總結出可以轉移給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學習和借鑒的經驗^⑨。即便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某些政府的政策和治理方式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正面結果，但西方學者直接的反應還是不去討論這些現象。西方學術界所壟斷的讀者（比如亞非拉國家的知識界）失去了全面、平衡地理解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的機會。

在西方學術界關心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治理能力、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等議題的背景下，正面地敘述中國經驗（或者關注對中國正面經驗的敘述），應該能夠幫助比較政治學界增進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和政治建設的理解。但是，北美比較政治學界對中國的研究，在過去三四十年來基本錯過了這個機會，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呈現出高度碎片化的現狀。以下列出一系列比較政治領域中的中觀層次的理論框架或視角，用以表明北美的比較政治在使用這些框架來分析中國案例上取得的有限成效。

（一）「東亞奇迹」的視角

由於地理和文化上的相近，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前的東亞地區和國家自然而然地成為比較的焦點。首先，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之間在政治經濟模式上存在巨大的差異；其次，對中國與它們之間的比較研究也只能停留在非常宏觀的層面，比如共同的儒家文化或干預式國家傳統。在微觀層面上，比如家庭的高儲蓄率、強調教育和節儉的文化傳統、企業家精神、家族企業傳統等方面^⑩，將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似乎並沒有產生有意思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討論經濟發展對政治發展的影響，比較政治學研究並沒有將中國的案例整合進以韓國和台灣為典型的某種「東亞模式」中^⑪。

（二）發展型國家理論

發展型國家理論主要來自戰後日本的經濟起飛經驗，即國家如何積極引導、指導、領導、促進、管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實踐^⑫。這一理論視角的總體思路是有意義的，因為經濟發展確實需要有獨立於社會的國家來引導；國家的失敗或失效通常被認為是當今世界大部分地區發展不足的原因^⑬。但是，全球不同國家主導的發展經驗和表現形式似乎差別很大。日本、東亞「四小龍」、中國仍然是僅有的成功案例，而印度、巴西、馬來西亞等經常被認為是負面的例子^⑭。對中國的「國家」如何影響經濟，主要的研究依然關注地方政府層面，而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對經濟起作用的方式可能差別巨大，從而導致北美研究中國「發展型國家」的學者，無法構建一個總體的框架來敘述和解釋中國政府如何參與和影響經濟發展，致使對中國的研究無法和比較政治整個學科融合起來。

（三）共產主義、後共產主義框架

隨着 1990 年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劇變，比較政治領域中的共產主義研究也失去了關注的對象。不過，的確還有一批對中國的研究依然試圖用共產主義—後共產主義的框架來審視中國，這一框架的核心論點或假

設在於：隨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中國這樣的共產黨體制國家終將崩潰^⑮。但中國的情況是，共產主義經濟體系顯然已經終止，並被市場經濟體系所取代；儘管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內容不斷地演變和重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依然在繼續前進。這一體制似乎能夠自我改革和適應新的社會現狀，並依然具有顯著的「韌性」和治理能力^⑯。

(四) 比較民主化研究

作為全球最大的非「民主」國家，中國是眾多比較民主化研究中的「房間裏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總體來看，比較民主化的研究案例主要是南歐、中東歐、拉丁美洲等所謂在「第三波」民主化中發生轉型(以及後來發生了逆轉)的國家。研究民主化的主要學者，對中國的案例都非常不熟悉，在他們的著述中涉及到中國的時候常常語焉不詳^⑰。另一類研究主要是通過大樣本跨國面板數據的計量模型，估算某些因素是否會增加一個國家發生民主轉型的概率^⑱。這一類研究得出的結論，卻無法用中國或任何一個單獨案例來檢測。例如，當大樣本的計量模型表明經濟增長會增加一國發生政體轉型的概率，我們只能據此相信，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每往後一年，中國發生轉型的概率就會增加。但除非中國真正發生轉型，否則我們還是無法確信該研究推論。總的來講，我們認為比較民主化研究中發現的對民主轉型有正面作用的結構性變量，例如居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中產階級的形成、公眾的親民主或自我表達價值觀的強度等，在中國都是在持續增加的^⑲。換句話說，這些變量的趨勢都在不斷增加中國發生民主轉型的概率，但中國的民主轉型卻遲遲沒有發生。

從更高的層次上看，全球政治近年來的種種現象，一方面似乎在迫使西方比較政治拋棄比較民主化研究的「目的論」，即政治發展的最終結果、最高階段必定是西方式的「民主」政體；另一方面，全球政治發展可能會導致我們重新思考政治科學中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比如甚麼是「好政府」？甚麼是「民主」？政黨對民主、代表、政治競爭意味着甚麼？二三十年後，學術界甚至有可能不再認為「民主」是唯一合法和理想的政府形式，從而整個比較民主化研究就會成為明日黃花。

(五) 國家建設框架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出現了大量民主化失敗的國家或不穩定的民主國家，國家建設因而成為一個突出的話題。斯坦福大學的政治學家萊廷(David D. Laitin)在2001年美國受到「9.11」恐怖襲擊後迅速預測，政治科學未來的研究重點將是「秩序」而不是「民主」^⑳。不久，國家建設、政治秩序、治理等成為比較政治研究的關注熱點^㉑。事實上，中國可能是國家建設上比較成功的

一個案例，但總的來說，中國案例在關於國家建設的一般文獻中沒有出現²²。換句話說，即使國家建設在中國取得了部分成功，我們還是無法知悉中國可以向北美比較政治研究的相關領域提供哪些經驗和教訓。與此同時，對中國政治領域的總體研究趨勢仍然是分析國家在監管、公共服務、腐敗控制等方面的失敗。儘管中國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有突出的表現，但比較政治大多關注中國的國家權力如何缺乏合法性、如何利用國家力量對社會進行鎮壓等議題²³。

(六) 專制主義和威權政權研究

在世紀之交民主化研究呈現一定的退潮之後，比較政治出現了一個研究「專制」政體的領域，迄今大多數研究都聚焦於中亞、中東、北非、拉美的政權，並且對這些政體中的選舉制度關注較多²⁴。歸根究底，這類研究將沒有進行多黨競選的政體統統歸為一類，並假設它們在很多關鍵領域是相似的，在概念和理論建設上恐怕不會走得太遠。研究中國的學者得出了諸如「諮詢威權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威權狹隘地方主義」(Authoritarian Parochialism)和「威權式審議」(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等各種「具有形容詞的威權主義」的概念²⁵，的確有助於比較政治學界更加細緻地理解中國政治、政體是如何運作、維持和再生產的。但簡單地認為沒有多黨競選的體制必然是不透明、缺乏問責性、依靠鎮壓來維持政治秩序等，還是掉入了意識形態或規範價值的窠臼。

綜上所述，北美高校中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近二十年來試圖將對中國的研究整合進比較政治學的學科對話中。從中國這個「田野」發現、歸納出來的知識，能否被研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比較政治學者認可和使用，是檢驗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對比較政治貢獻的重要標準。這方面，從中國「田野」裏形成或歸納出來的一些概念和理論，例如，「破碎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中國式聯邦主義」(Federalism, Chinese Style)、「相互問責性」(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依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沒有民主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等等²⁶，對研究其他發展中國家和非西方式「民主」國家的確產生了一些影響。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學科對中國政治的認識，但對比較政治領域產生的影響還是很有限。

三 中國崛起與比較政治學

以上說明，比較政治至今依然是以北美學術界為主體構建和生產的一個學科場域。由於這一結構性特徵，比較政治具有明顯的地方性，所謂「全球

性」的比較政治其實尚未形成。就中國與比較政治的關係而言，其中的地方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比較政治對中國這個案例的研究，在規範價值、理論框架上，具有明顯的地方性，也可以說是具有嚴重的西方(北美)中心主義特徵。事實上，西方學術界的確具有相當顯著的自我批判意識和能力，所謂的「東方主義」視角已被公認為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沒有學者可以公開地抱持一種「東方主義」的視角來觀察、研究、敘述中國或世界其他地區²⁹。但是在潛意識和價值觀層面，西方中心主義、自由民主霸權等框架還是不可避免地束縛或規制着部分學者的思考方式。要打破、動搖這樣的思維範式或潛在的規範主義基礎，一個方法是由非西方的學者提出替代的框架和範式，並對其產生衝擊。

這也正是當前比較政治帶有地方性的第二個方面的表現。非西方的中國或其他地區的政治傳統、政治實踐，並未能在比較政治的學科圖景中被表達出來。這是由很多障礙造成的，而要破除這些障礙，最有效、也是最有可能的方法是，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政治學者逐漸在全球的比較政治學場域中成為參與討論的聲音。新世紀以來，一些學者試圖將中國的政治概念如「社稷」、「政道」、「民心」、「民本」、「群眾路線」等進行操作化，開始與實證的比較政治融合和對話³⁰，並構建新的比較政治理論和概念體系³¹。

大約從2010年前後或稍早一些開始，中國國內高校年輕一代的政治學者在國際刊物發表的論文逐漸增多³²。與此同時，在西方一流高校的政治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年輕學者大量回到國內高校任職，並很快開始在國際知



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一批以比較政治為研究重點的學者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群體，稱為「五角場學派」。(資料圖片)

名刊物發表論文^⑩。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發表比較政治學術作品和參與比較政治討論的學術工作者中，具有中國背景或從中國成長起來的學者比例將持續增加。

這些受過海外學術訓練後回到中國高校從事學術工作的學者群，會逐漸將西方比較政治的理論、方法與面對中國的政治實踐產生的學術關切結合起來，生產出有別於西方高校裏比較政治學者的學術成果。與此同時，隨着他們在全球比較政治的參與度逐漸提高，無論是中國境內還是西方高校裏的比較政治學者，都將會從中國這個案例中開發出有別於西方比較政治學現有的概念和視角。在此基礎上，學者就有可能構建出有別於西方現有的理論和敘述，從而改變比較政治的知識圖景和理論譜系。這裏試舉三個例子，說明中國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對比較政治拓展、修改理論框架、概念體系可能產生的顯著影響。

(一) 政黨

現有比較政治學領域中對政黨的研究，基本無法解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運作，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等等。雖然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運作方式、機構組成等生產了大量的文獻，但是這些文獻和比較政治研究中關於政黨的一般文獻基本上是完全隔離的。西方媒體和大眾的討論場域裏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解，一般都以否定它的合法性、執政能力、自我組織、管理、發展和進步的能力為基本假設。就黨本身的建設、管理、再造來看，中國共產黨的眾多機制，是比較政治學中政黨研究有所忽略的^⑪，這包括四方面：

第一，嚴格的黨員吸收標準和吸收程序：必須是有政治信念、政治熱情、優異的專業素養和突出的個人能力的公民，才可能被吸收入黨。第二，嚴格的黨員管理、培養、提拔機制：從普通黨員到幹部，從初級幹部到高級幹部，必須經歷較長時間的鍛煉、培養，在眾多黨員中脫穎而出，才可以逐級提拔到負有愈來愈多責任和掌握愈來愈大權力的位置。第三，自我教育、自我更新的機制：黨內有一系列對黨員和各級幹部進行定期與不定期培訓的機制，黨員和幹部時時都在學習新的理念、政策、趨勢等。整個黨也具備從過去失敗中吸取教訓、理解和掌握新的局面的學習能力。第四，黨的自我清理機制：黨的紀檢系統和黨內一些體制如「民主生活會」，能夠消滅和抑制黨內不良趨勢的形成和發展、清理黨內的腐敗成員，等等^⑫。而在黨與社會的關係上，部分西方學者或評論員受到有關極權主義和對蘇聯體制研究的理論框架深刻影響，一般都將「黨」和「社會」分割開來，想當然地認為社會（人民）必定是反對黨的統治，而黨必定是依賴鎮壓、意識形態灌輸（洗腦）、利益收買來統治社會^⑬。但事實上，黨員和黨員的家人本身即是社會的一部分，黨和社會隨時都在互通信息，是相互融為一體的^⑭。

(二) 黨國體制、民主理論

比較政治學中一個基礎理論是政體理論和與此相關的民主理論，即將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體系分為「民主」和「專制」等類型來理解。政體理論一般把中國歸為一黨威權體制(one-party regime)，但中國由一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體，不是簡單地用一黨威權體制就能解釋的。中國1949年以後「黨政一體」的體制，近年來更逐步形成了內部的三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分工而又統一的架構。這既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也是現有比較政治的威權主義政體或一黨體制理論尚未開始探討的。中國有學者認為，西方的政治哲學是分而治之，而中國的政治哲學是合而治之。東西方政治哲學這樣的基礎性差異是否存在、如何相互影響等，都是未來比較政治需要進行研究的。

(三) 合法性理論

合法性理論近年來深受學界關注，但是「合法」這一概念本身帶有顯著的地方性色彩。「法」、「合法」的概念，在東西方政治傳統中本來就有很大的不同，而將“legitimacy”翻譯作「合法性」，又生造出一個中文語境不存在的概念。有的學者認為「合法性」(legitimacy)原本表達的是「正當性」的意思，這其實說明了「合法」的概念在中西語境中的差距。但“legitimacy”是不是更接近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民心」、「政道」等概念^⑤，或許才是比較政治學者需要用實證方法來研究的問題。現有比較政治研究將合法性理論與民主理論緊密結合，將自由民主體制定義為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是冷戰以來全球意識形態衝突對政治學發展造成的影響。近年來，在西方的民主體制運作面臨眾多困境，全球發展模式、治理模式的對話和競爭重新展開之際，有關合法性的概念和理論需要重新建構。

以上三個例子說明，中國概念與思想、理念有條件成為比較政治中主流的思想和理念(即所謂的「主流化」[mainstreaming])。一個可以用來類比的例子是，隨着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增大，英文媒體(特別是財經媒體)中的一個新詞愈來愈變成了一個常用詞：「紅幣」(the redback)。過去媒體用「綠幣」(the greenback)指代美元，如今開始用「紅幣」指代人民幣，顯然，一個源於中國的概念逐漸被接受為一個常用(主流)的概念了^⑥。我們有理由相信，涉及到政治的很多基本問題，如政黨、政體、合法性等概念和制度，民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與國家、公共利益與個人主義、秩序與自由、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等方面，都將體現中國崛起對全球的比較政治的影響。

然而，在中國學術界理所當然地開始參與全球學術的對話的今天，也需要警惕自己的學術民族主義。我把「學術民族主義」定義為盲目強調中國的特

殊性和中國學術能力、學術思想等相對於西方的優越性。中國的學人試圖「超越西方」是有益的理想和雄心，但這需要建立在完全學習和掌握了西方的學術之上。不可否認，在方法論、實證主義和自覺地實踐各種知識學（如民族志、人類學、心理學、定量研究）等方面，北美主導的比較政治已經發展到相當的水平，中國學術界需要努力參與，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真正參與影響和塑造全球的知識圖景，首先要避免關起門來自娛自樂地以為中國學術已經或很快就會超越西方。

具體來說，要達到和西方學術界對話和爭論的水平，首先中國學者要能夠在西方主流的學術刊物發表文章。雖然中文世界出版的論文和著作，也會有一部分逐漸傳播到中國以外的世界，但在目前全球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模式下，要先能在英文的出版世界對西方現有的理論範式提出挑戰，其前提是對西方相關學術領域有充分的理解；其次是中國主辦的學術刊物（而且應該是英文刊物），要能成為西方學者積極投稿、爭取發表著述的對象。專著方面也一樣，中國的學者需要通過西方一流的學術出版社（如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出版社和美國各頂級大學的出版社）嚴格的學術著作審稿程序然後出版專著，才算是具備和西方學者對話的能力。

四 結論：通往全球視野的比較政治知識體系

中國作為有着幾千年的政治實踐的承載體，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已經生產出了海量的政治概念、思想和理論；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實踐的場所，為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複雜性。這兩者共同決定了中國對於全球比較政治學具有潛在的重大影響。由於中國在本世紀上半葉在全球國家體系、經濟版圖中的崛起，這種潛在的影響可望轉化成實際的影響。這一轉變是由兩個結構性變化帶來的：一方面，中國在全球的經濟體量和政治影響力的大幅增長使得中國案例成為比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客體」；另一方面，中國知識界和學術界在全球知識生產中所佔據的比例持續擴大，以中國學者為「主體」生產的知識勢將成為全球知識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對比較政治這一學科來講，要充分利用和把握中國崛起給知識生產——這一迄今為止由北美主導的領域——帶來的機會，需要在知識哲學的層面進行根本性轉變。現有比較政治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品質是良好的，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大多數時候採取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立場，只會在較低的經驗水平上才能實現；在更高層次，即規範價值的層面上，我們的研究和觀點實際上是被某種意識形態或價值體系所限定的。學者常常相信自己是帶着一套普世、客觀的價值來研究和觀察客觀世界，而意識不到其實心目中的「普世」、「客觀」被自己的規範價值所限制。對我來說，真正的普世價值的確存在，但只是在本體論層面上。知識工作者、學者、哲學

家作為認識、描述、表達普世價值的主體，是客觀上的普世價值與人們大腦裏認識到的普世價值之間的媒介。因此，任何單個學者或知識份子傳統所理解和表達出來的「普世」或「客觀」的概念，始終是相對的、有限的和局部的。

客觀地講，北美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界，對於任何人腦中的知識與認識的局限性、主觀性、局部性的警惕還是相當高的——特別是人類學、社會理論、文化研究等領域和批判理論傳統，在這方面尤其敏感；中國的學術界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距離。在未來中國學術界力圖超越中國、全面研究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社會、文化時，如果在這方面缺乏敏感性，將會遭遇巨大的挑戰。但是，以北美為代表的整個社會科學界近年來都表現出明顯的科學主義、數學主義的趨勢，實證的政治學研究（包括比較政治）受到的影響也很明顯^③。在這種背景下，比較政治學者非常容易陷入方法論的迷信，不能在認識論上形成批判性的視角，對於跨文化、跨國家的知識交流形成巨大的障礙。

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我們看到，要實現真正的全球性的比較政治場域，知識界還面對着很多真實的挑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政治實體，其變遷的過程和持續的政治實踐將會為比較政治學界帶來不僅僅是概念、詞彙、術語、理論、話語的改變，甚至可能帶來很多規範價值和信念的改變。儘管中國的崛起很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擴大和豐富比較政治的思想和觀點，帶動全球比較政治步向一個嶄新的場域，但未來幾十年，新的知識生產領域格局的形成將仍然是一個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話、競爭、衝突、協商、妥協和相互吸納的過程。

註釋

① 在本文中，「比較政治」、「比較政治學」、「比較政治研究」這三個概念基本可以互換。英文語境中並沒有「比較政治學」的提法，只有「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而在中文敘述中，“comparative politics”可以稱為「比較政治」，但也可以對應中文的表達方法，稱為「比較政治學」。

② 此處使用的「東方主義」概念，即西方人對西方以外世界的想像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觀念的藐視與偏見。參見薩義德(Edward Said)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2007)。

③ 本文對「民主」、「專制」等概念加上引號，表示這些概念的涵義是受現有比較政治學領域的話語體系框定的。

④ 比較政治學中，「第三波」的概念最早由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並加以論證，此後成為一個通用的概念，代表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全球範圍內的一波民主浪潮。但事實上，全球範圍內的民主化是否以「波次」的形式發生、同一時間段內不同政體發生的某種政治轉型是否相互有關聯，在理論上和實證上仍然是不確定的。參見Renske Doorenspleet, “Reassessing the Three Waves of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2, no. 3 (2000): 384-406。

⑤ 關於好政府和善治的文獻，比較典型的有Judith Tendler, *Good Government in the Tropic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綜述文

獻可參見Ved P. Nanda, "The 'Good Governance' Concept Revisite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603, no. 1 (2006): 269-83。

⑥ 也有例外的作品，例如Bo Rothstein, "The Chinese Paradox of High Growth and Low Quality of Government: The Cadre Organization Meets Max Weber", *Governance* 28, no. 4 (2015): 1864-1920。

⑦ 諾頓(Barry J. Naughton)、拉迪(Nicholas R. Lardy)與羅斯基(Thomas G. Rawski)等北美大學裏的經濟學家，從上世紀80、90年代起比較全面地追蹤中國經濟的發展與轉型。

⑧ 最近的一本著作試圖正面地刻畫中國減貧現象發生的過程，參見Yuen Yuen Ang,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⑨ 政策界對中國經驗的看法較為正面。2008年，世界銀行任命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擔任其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實際上是對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經驗的肯定。

⑩ Joseph E. 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 ed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⑪ Dali L. Yang, "China's 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 Dynamics and Pitfall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2, no. 1 (2016): 45-70。

⑫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⑬ Francis Fukuyama,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4)。

⑭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Vivek Chibber,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⑮ Martin K.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teven Saxonberg, *Transitions and Non-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 Cuba, North Korea, and Viet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⑯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no. 1 (2003): 6-17; Dali L.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⑰ 例如奧唐奈爾(Guillermo O'Donnell)、林茲(Juan J. Linz)、戴蒙德(Larry Diamond)、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眾多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學者，都無法對中國這個案例給出系統性、嚴謹的評論。金(Gary King)或許是一個新近例子——一個本來研究方法論的學者，對中國的互聯網信息管理進行了研究，參見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2 (2013): 326-43。

⑱ 例如 Carles Boix,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dam Przeworski et a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⑲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⑳ “David D. Latin: Culture, Rationality, and the Search for Discipline”, in Gerardo L.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601-48.

㉑ John J. Bailey and Roy Godson, eds., *Organized Crime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Mexico and the U.S.-Mexican Borderlands*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Hernán F. G. Bruera, *Lula, the Workers' Party and the Governability Dilemma in Brazil*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3); Richard Caplan, ed., *Exit Strategies and State Buil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Francis Fukuyama, *State-building*; Eran Vigoda-Gadot, *Building Strong Nations: Improving Governability and Public Management* (Burlington, NJ: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3); Lucan A. Way,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The Cases of Belarus, Moldova, Russia, and Ukraine”, *World Politics* 57, no. 2 (2005): 231-61.

㉒ 楊大利的書是個例外，參見Dali L.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㉓ Yuhua Wang and Carl Minzner,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Security 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2 (June 2015): 339-59; Diana Fu and Greg Distelhorst,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sion under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The China Journal*, vol. 79 (January 2018): 100-22; Lynette H. Ong, “Thugs and Outsourcing of State Repress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vol. 80 (July 2018): 94-110.

㉔ 例如Jennifer Gandhi and Ellen Lust-Okar, “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no. 1 (2009): 403-22; Milan W. Svobik,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㉕ 這些概念分別參見Rory Truex,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 no. 3 (2017): 329-61; Melanie Manion, “Authoritarian Parochialism: Local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8 (June 2014): 311-38; Baogang He and Mark E. Warren,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9, no. 2 (2011): 269-89。

㉖ 這些概念參見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no. 1 (1995): 50-81;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Lily L.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等作品。

㉗ 2017年，《第三世界季刊》(*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發表了一篇論文，認為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間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推行殖民主義帶來了很多正面的效果。該文章受到學界嚴厲批判，最後主編被迫要求作者撤稿。

⑳ 王紹光：《中國·政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Yun-han Chu,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Review* 13, no. 1 (2013): 1-42.

㉑ 潘維：《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㉒ 例如Xufeng Zhu,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49, no. 2 (2009): 333-57; Yihan Xiong, “The Broken Ladder: Why Education Provides No Upward Mobility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1 (March 2015): 161-84。

㉓ 例如Min Tang and Narisong Huhe, “Alternative Fram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Support in Authoritaria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5, no. 5 (2014): 559-76; Cai Zuo, “Scaling Down: Subnational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hinese Politic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14, no. 3 (2015): 318-39; Qingjie Zeng, “Democratic Procedures in the CCP’s Cadre Selection Process: Implementation and Consequenc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5 (March 2016): 73-99; Changdong Zhang, “A Fiscal Sociological Theor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Sociological Theory* 35, no. 1 (2017): 39-63。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一批以比較政治為研究重點的學者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群體，稱為「五角場學派」（五角場是上海高校比較集中的一個地區）。

㉔ 也有幾個例外，包括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Kjeld E. Brødsgaard, “Politics and Business Group Formation in China: The Party in Control?”,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1 (September 2012): 624-48。

㉕ 有一些研究涉及到黨的各種制度與機制，例如Maria Edin, “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no. 1 (2003): 1-15; Kjeld E. Brødsgaard, “Politics and Business Group Formation in China”, 624-48; Thomas Heberer and René Trappel, “Evaluation Processes, Local Cadres’ Behaviour and Loc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no. 84 (2013): 1048-66。

㉖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

㉗ 有一些研究注意到「黨」其實是和社會緊密連接的，例如Patricia M. Thornton, “The Advance of the Party: Transformation or Takeover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3 (March 2013): 1-18。

㉘ 「民心」的概念，參見潘維：《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政道」的概念，參見王紹光：《中國·政道》。

㉙ 例如，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就是〈紅幣的崛起〉。參見“The Rise of the Redback”, *The Economist*, 20 January 2011, www.economist.com/node/17959580。

㉚ Carles Boix and Milan W. Svolik, “The Foundations of Limite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Power-Sharing in Dictatorship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5, no. 2 (2013): 300-16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又如Lily L. Tsai and Yiqing Xu, “Outspoken Insider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Authoritarian China”, *Political Behavior* 40, no. 3 (2018): 629-57。